

# 从《左氏博议》到《左氏传说》

程小青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吕祖谦的《左传》学研究成果,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有《左氏博议》、《左氏传说》等著作。《左氏传说》的成书后于《左氏博议》。细读这两部书,可以看出吕氏对同一现象、同一问题的看法常有变化。《左氏传说》往往较《左氏博议》的主观色彩减少,也较少理学说教,显得比较客观平实,着重探讨其深藏的历史真实;其次,《左氏传说》较之《左氏博议》更顾及全貌,能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表象本质,让读者从评议看到一个完整、全面的历史真实;另外,《左氏传说》在分析人物、事件时,更注重其背后的历史必然。总体而言,《左氏传说》看问题更全面、深刻,眼光更阔大,反映了一个学者走向成熟的气度。

**关键词:** 吕祖谦;《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宋代理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2-0116-05

## The evolution from “Zuoshi Boyi” to “Zuoshi Zhuanshuo”:

A discussion of Lü Zuqian's two works on “Zuo Zhuan”

Cheng Xiao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Among Lü Zuqian's studies of “Zuo Zhuan”, “Zuoshi Boyi” and “Zuoshi Zhuanshuo”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Zuoshi Zhuanshuo” is a later work compared to “Zuoshi Boyi”, which would often convey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ame phenomenon or topic. The evolution from “Zuoshi Boyi” to “Zuoshi Zhuanshuo” is elaborated. Zuoshi Legend is rather objective and plain, focusing on historical truth while carrying less Confucian teaching. It is more comprehensive, which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issues and natures in describing historical facts, offering a completed historical fact. In analysing historical figures, the book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n the whole, the book is comprehensive, deeper, has a broader vision, indicating that the author was developing into a mature scholar.

**Keywords:** Lü Zuqian; “Zuoshi Boyi”; “Zuoshi Zhuanshuo”; Confucianism of Song dynasty

宋代理学家群里,吕祖谦格外重视史学,尤其推崇《左传》,多次称赞道:“《左氏》综理微密,后之为史者鲜能及之。”<sup>[1]</sup>“《左传》字字缜密。”<sup>[2]</sup>“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益底书。学者看得《左传》熟时,以下诸史条例,亦不过如此。”<sup>[2]</sup>“史当自《左传》至《五代史》依次

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sup>[3]</sup>重视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因此,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倾注较多心血的是《左传》一书。这方面的成果,仅就目前已知就有《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左传类编》、《左氏统记》、《甲午左传手记》、《左

氏纲目》、《左氏国语类编》等八种。其中《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和《左氏传续说》三种,影响最大。我们把这三种著作通读一遍,就会发现,随着研究、思考的逐渐深入,他对同一现象的看法常有变化,《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里补充或纠正《左氏博议》的情况比较多。例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记载孟献子与穆伯在莒所生二子的事,在《左氏博议》第二十二卷“公孙敖二子”条评议说:“味二子之言,反视孟献子若大父行,自处于孺子之列。《左氏》从而载之,亦忘二子为叔父也。献子虽地居宗主,位列国卿,然天属尊卑,要有常分。爱而不敬,固已非礼,二子见人爵之尊而忘天属之重,后人之载笔者亦从而忘之。权位之移人,可畏哉!”<sup>[4]</sup>批评孟献子处事不合于礼。《左氏传续说》第六卷“孟献子爱穆伯二子或譖之曰将杀子献子以告季文子”条则认为:“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献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博议》所论此事非是。”<sup>[5]</sup>

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左氏博议》和《左氏传说》中一些条目进行具体分析,由此了解吕祖谦在《左传》研究中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 一

比较《左氏传说》和《左氏博议》对于相同人物或事件的分析,我们发现《左氏传说》往往较《左氏博议》的主观色彩减少,也较少理学说教,显得比较客观平实,更多的是探讨其深藏的历史真实,表现出吕祖谦的学术生涯由理学倾向走向史学的倾向。

例如,《左传》隐公三年、四年集中讲卫国州吁恃宠作乱弑君,石碏无力平乱,且不能制止儿子厚追随州吁,不过最终还是借陈人之手杀了州吁,同时也亲自下令杀了儿子。《左传》引君子的话称赞道:“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在《左氏博议》里吕祖谦对石碏是这样评论的:“石碏之谏善矣,惜其进言之晚也。”<sup>[6]</sup><sup>12</sup>认为石碏没有及时劝谏,才导致一系列恶果的产生。他认为,卫庄公宠州吁,不过是由于溺爱,未曾料到他会“篡弑”;州吁自己最初也没有篡弑的企图,乃是一步步发展的结果。他深入分析了人物心理内在的演变逻辑:“虽州吁受宠之初,亦未尝有篡弑之心也。及因宠而骄,因宠而暴,庄姜恶之,桓公忌之,州吁始忧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

矣。有篡国之利诱其前,有杀身之祸迫其后,而弑逆之谋成矣。彼州吁之初心,岂自料至此哉!”既然州吁有可能“不至于逆”,如果石碏能及时进谏,就能制止后来悲剧的发生。他并由此生发如下联想:“迨夫一念之恶藏于胸中者既熟,遇事则见,遇物则动,外之恶习召内之恶念,内之恶念应外之恶习,以恶合恶,若川之决,若火之燎,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说明“一念之恶”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如果能及时阻止其发展,就不至酿成祸患。因而他再从理学家角度加以阐发:“君子之治心,当明白四达,俾秋毫之不正无所容,而后容。苟容秋毫之不正焉,犹播一粒之稊稂,……盖既有此根,必有此苗,欲除稊稂之害,当除稊稂之种可也。”随事立论,强调正心诚意修身过程中警惕“秋毫之不正”,避免个人的道德灾难。这里,对州吁恃宠作乱事件中石碏没有及时劝谏一事,着重从“一念之恶”能否及时得到有效制止的角度立论,强调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吕祖谦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教化人心,正如胡凤丹所说:“发而读之,叹其经纬世教,扶植人心,有裨于圣学者正复不少。”<sup>[7]</sup><sup>580</sup>明显看出了吕氏作为理学家的特点。

然而,《左氏传说》对石碏之谏则作如是说:“所谓‘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见得先王教子,家传之法尚在。”<sup>[8]</sup><sup>1</sup>评论的角度发生变化,不再是批评其“进言之晚”,而是认为石碏身处“东迁之初”,所以“言多典法”,其言可取,其事可法,对石碏进行肯定,从历史背景、历史制度方面对“石碏之谏”作出说明,相对而言较少主观色彩,未作过多的理学发挥。

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侵曹、伐卫事,《左氏博议》深入分析了晋文公心理,认为侵曹伐卫是为了引得楚国发兵。但楚国曾有恩于自己,“遽加兵于楚,则天下必以我为背惠食言,其谁与我?于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卫,皆楚亲暱,外无背楚之名,而内有怨楚之实。使兵端发于楚,而不发于我。待楚之先动,而后徐起而应之,则虽破楚,而无背惠之名”<sup>[9]</sup><sup>359</sup>。晋文公的诡谲可见一斑。吕氏随后还列举了其它几件事以力证晋文公“善谲”,尤其是对“退三舍”的分析。在吕祖谦眼里,晋文公的所谓退避三舍其实是很矫情的:“至于退舍之事,则其谲又深矣。

楚本无与晋竟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战,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战,而形若不欲战,用以报德,用以骄敌,用以感诸侯之心,用以作三军之愤。”<sup>[9]359-360</sup>认为文公居心叵测。对晋文公这一人物,《左氏博议》不认同《左传》的观点,《左传》宣扬的文公十分完美,吕祖谦认为文公的问题很多,对他的评价是:“断之一字曰‘譎’而已。”“观晋文之生平,千源万派,滔滔汨汨,皆赴于一字之内。动容周旋,横斜曲直,无往非譎。”<sup>[9]358</sup>批评十分严厉。在《左氏博议》里边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翻案文字,有些是很有启发性的,读者可以由此见出吕祖谦的才气。这也正如胡风丹重刻《东莱博议》序说的那样:“《博议》议书,牖启聪明,如山水丝竹之怡悦性情而脍炙人口。”<sup>[7]581</sup>

同是侵曹伐卫这件事,《左氏传说》将它与晋文公之前的春秋霸主齐桓公进行比较:“桓公封卫迁邢,以存亡国。文公执曹伯、卫侯,使其国乱。”<sup>[10]44</sup>结论是文公不如桓公。他还分析了同是一时霸主,“然晋文公之规模,与齐桓大段不同”、“种种不如桓公”的具体表现,但又实事求是地承认:“桓公霸业不继,而文公虽死,霸业不绝。”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吕氏认为,晋文公“只缘有一件胜如齐桓”,即对人才的态度、做法不同:“前说管仲一身任事,不能为齐求人材,而晋专务收人材,看得晋国人材之盛,皆出于狐、赵。”“晋人材之所以盛,缘狐、赵之徒,倡推贤让能之风于上,一国所以皆有此风。”“其流波之及,直至如此。故晋之霸业所以长久,桓公之霸业所以不永也。”<sup>[10]44-45</sup>对晋文公的评价比较全面,同时看到了他的优点和缺点,明显比较客观。同时也能从大处着眼,从大的历史背景中找出原因来。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左氏传说》多以“立乎其大”的历史眼光看待人物事件,而不再斤斤于细节、小事,境界较之《左氏博议》阔大,分析也远较《左氏博议》客观、深刻。

## 二

比较《左氏博议》和《左氏传说》对人物、事件的分析、评价,我们看到二者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左氏传说》没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顾及全貌,并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表象本质,让读者从评议看到一个完整、全面的历史真实。

举例而言,郑庄公耍手段剪除弟共叔段一事,

是《左传》开头部分的一件大事,左氏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有详尽的记载。《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和《左氏传续说》对其中的除弟、母子和好如初等都有几处评论。现仅就《左氏博议》与《左氏传说》对郑庄公除弟一节的评议,比较吕氏前后认识的变化。

《左氏博议》认为:“庄公之心,天下之至险也。”因为他对于共叔段的种种“不度”、“非制”做法,“其始置不问者,盖将多叔段之罪而毙之也”。他用了大段文字反复揭露庄公的险恶用心:“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而欲必置之死。故匿其机而使之狎,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之成。……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就连他后来封许叔,并说出“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其糊口于四方”等改悔的话,也是庄公“欲以欺天下也”。总之,庄公“既欺其朝,又欺其国,又欺天下,又欺后世”<sup>[6]2-4</sup>。若以这些诛心之论来说,在吕氏那里,庄公俨然穷凶极恶,十恶不赦。

同是一个庄公,同样一件事,到了《左氏传说》,看法就很不同。虽然依旧批评其铲除共叔段的做法是“忍”(阴狠),但对郑庄公的其他一些优长给予了肯定、称赞。先是说:“郑庄公有权谋,善用人,当时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驾、曼伯、子元之徒,皆为之用,故能以小而强。而其后有子皮、子产之徒出来。”<sup>[11]</sup>接着又说:“观庄公封许之言,委曲涵养,有唐、虞、三代气象。”<sup>[8]4</sup>如上述所谓“寡人有弟,不能和协”的话,吕氏也肯定地说这“正是兄弟不可泯绝处”<sup>[8]4</sup>,而不再是“岌岌乎险哉,庄公之心欤”了<sup>[6]4</sup>。不再攻其一端不及其余,而是能够全面、客观、历史地对待人和事。唯其如此,《左氏传说》能够比较公允地评价郑庄公的功过是非,语气上也显得平和多了。

他如,《左传》鲁僖公七年记载,郑国太子华请齐国帮助除去国内的三族实力派,不但愿意当内应,而且应许以后举国臣属于齐。齐桓公本想答应,被管仲阻止而辞郑太子华之请。

对此,《左氏博议》指出:“郑子华以世子而卖其国,齐桓公贪其利而将受之,从管仲之谏而止,世莫不诵管仲之言以为当。”可在吕氏看来,“以吾观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sup>[12]240</sup>为何这样说呢,因为管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为善”,其用以说服齐桓公的只是以桓公“好名之心”来压

下自己的“好利之心”，完全是治标不治本。吕氏此处宣扬的还是理学自省“治心”的那一套。

《左氏传说》则主要肯定管仲的话说得好，“这一段见得管仲犹有三代气象”<sup>[13]29</sup>；并认为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管仲“尝与闻先生长者之余论，故时出其所闻，实有过人者”，“故所以辅桓公者，犹有三代之遗制”的缘故。尽管惋惜“管仲不能大其规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个狭小规模”，但他终究能“时时归正得桓公一两段”<sup>[13]30</sup>，远比晋文公、楚庄王身边的臣子强得多。对管仲说的同一段话的评价，前后迥然不同，后者更实事求是、辩证客观，透着大气。

### 三

《左氏传说》在分析人物、事件时，更注重的是其背后的历史必然，分析利害成败的原因，从而准确把握最主要的因素。以下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左传》记鲁宣公三年楚庄王攻伐陆浑，到达洛水，周定王派人劳军，庄王居然“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欲取而代之。《左氏博议》分析楚子问鼎的原因：“由东迁以来，周之君臣上恬下嬉，奄奄略无立志……今三代所传之大宝镇器，蛮夷跋扈，乃敢睥睨摇荡，欲以腥膻污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祸变孰大于此？”<sup>[14]544</sup>愤愤不平之情跃然纸上。对于严词应对楚子的王孙满，《左氏博议》认为表面上暂时让楚人不敢生非份之念，其实深埋下祸根，所以“王孙满却楚之功，不足偿其怠周之罪”<sup>[14]545</sup>。吕氏此说固然可行，但对王孙满而言，又显得太苛刻了，因为他毕竟让楚庄王一时语塞，将了楚王一军。

《左氏传说》对楚子问鼎一事，则是这么分析的：“盖缘当时之人，风声气习都不知君臣之大义，人皆有此患，视篡夺之祸，不以为怪，以为常事看了。”<sup>[15]66</sup>从当时历史的现实出发，看到历史的发展趋势，更贴切与深刻。没有再挑王孙满的刺儿，并批评“今《左氏》不见其大恶，而特取其末节”<sup>[15]66</sup>，认为《左传》对楚王问鼎一事太在意。

其二，《左传》记楚平王初登基时不扰民，到后来却不扰民，导致楚国未能振兴。对此《左氏博议》和《左氏传说》的评论很值得玩味。

《左氏博议》在分析楚国不振的时候归咎于楚平王没有把不扰民政策坚持下去，没几年就

“不能守是法”，而是“宫室无量，民人日骇”<sup>[12]215-216</sup>。批评平王没有“常守是法”<sup>[12]215</sup>，这说法当然是符合实际的，然而没有切入要点，显得笼统、含糊。《左氏传说》则具体而微地探讨了楚平王昨是今非的深心，批评他“徒有息民之名，而无息民之实。”“错认了息民之名，而不究息民之实。”<sup>[16]154</sup>因为，真正的“息民”，不但要“息民于外”，对外无战事；还要不“劳民于内”，对内“器用不作，衣服从给”，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可楚平王却认为“所谓息民者，止免用兵之役一件而已”。其实“劳役有甚于用兵”，在国内“作许多宫室土木之工，反过于用兵”。吕氏由此得出结论：“此其所以终于吴入郢而至于败亡。”<sup>[16]154</sup>分析全面、深刻，发人深省。

总而言之，对于同一问题、同一事件，《左氏传说》的看法常常发生变化，比《左氏博议》的眼光阔大，也更深刻。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兹不赘。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比起《左氏博议》来，《左氏传说》对人物、事件的认识，不论是角度、深度还是视野，都有明显的不同。

以上这三方面的特点，也反映出吕氏在写《左氏传说》与《左氏博议》两个阶段的不同写作状态。《左氏博议》成书时间很明确，是吕氏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冬起讲学“东阳之武川”期间所作，目的是与弟子们“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sup>[17]</sup>。这时作者30刚出头，难免血气炽盛，咄咄逼人，而且从《自序》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写得比较匆促，写作历时不长，又本是为“课试”而作，有时难免以文害意。《左氏传说》的写作时间目前无考，但明显后于《左氏博议》。因为我们在《左氏传说》里看到吕氏多次提到《左氏博议》，且多为纠正、否定《左氏博议》的看法，而在《左氏博议》里没有一处提及《左氏传说》，以此可判定二者写作时间的先后。正是因为《左氏传说》的写作时期较晚，人生阅历增加，学术水平更高，而且不再像《左氏博议》那样充满功利色彩，而是在做“为己”的学问，从而使《左氏传说》在《左传》研究方面能够更加从容与深入，从而更上一层楼，取得了新的成果，显示了此一阶段的吕氏作为一个学者走向成熟的气度。

参考文献：

[1] 吕祖谦.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三·甲午《左传》手记[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一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559.

[2] 吕祖谦. 左氏传续说·纲领[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3] 吕祖谦. 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杂说[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一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715.

[4] 吕祖谦. 左氏博议:卷二十二[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508.

[5] 吕祖谦. 左氏传续说:卷六[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143.

[6] 吕祖谦. 左氏博议:卷一[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7] 胡风丹. 重刻《东莱博议》序[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8] 吕祖谦. 左氏传说:卷一[M]//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9] 吕祖谦. 左氏博议:卷十五[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0] 吕祖谦. 左氏传说:卷四[M]//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1] 吕祖谦. 左氏传说·看左氏规模 [M]//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2.

[12] 吕祖谦. 左氏博议:卷十[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3] 吕祖谦. 左氏传说:卷三[M]//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4] 吕祖谦. 左氏博议:卷二十四[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5] 吕祖谦. 左氏传说:卷五[M]//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6] 吕祖谦. 左氏传说:卷十四[M]//吕祖谦全集:第七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7] 吕祖谦. 左氏博议. 自序[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575.

(责任编辑：王明秀)



(上接第 110 页)

时值林纾逝世 90 周年之际,我们选择运用新历史学的观点来编纂这部《林纾年谱长编》,意在对林纾生平事迹进行知识考古和重新评估,为未来林纾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做好前期文献准备;同时,

这种以学校创办人为切入点的历史梳理活动,对于目前福建工程学院即将启动的大学文化建设必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Foucault 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M]. trans. Smith A M S. New York: Pantheon, 1976.

[3] White H.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IX.

[4] 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1.

(责任编辑：许秀清)